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3.004

#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启示

罗馨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毛泽东 1956 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具体论述了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强调中国的东西有自己的规律,并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和革命表现形式的讨论,在哲学高度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关于“中国化”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内蕴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共性与个性)、中国化与国际化、传统性与现代化等多对哲学辩证关系,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其二,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其三,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子”。

**关键词:**毛泽东;“两个结合”;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3-0028-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①</sup>(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两个结合”不仅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应用层面的相结合,也注重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中国化”)以及开花、结果(“化中国”)的逻辑必要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两个结合”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内涵的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新叙事的逻辑起点。而 1956 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作为毛泽东论“中国化”的一篇重要文献,具体关涉共性与个性、内容与形式、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多重辩证关系,其中对于“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的系列论述,对我们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两个结合”,乃至接续展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视野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启示与价值意义。

## 一 共性与个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

1956 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作为毛泽东论“中国化”的一篇重要文献,它的重大价值意义绝不仅仅停留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艺术文化发展层面,而是深刻体现了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重大时代命题的深层次思考。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在内部哲学理路上与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的辩证关系具有基本的逻辑同构性

在《谈话》中,毛泽东基于文化比较角度明确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KS002)

作者简介:罗馨(1993—),女,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 页。

了作为近代机器大工业时代产物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借鉴性,并从共性和个性角度探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不同民族形式的张力关系问题,认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sup>①</sup>。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的形成有其基本原则即共性,比如艺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就是科学原理,无“中学”“西学”之分。但根据各自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影响而又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或者表现形式即个性。所谓“共性和个性”的二元辩证关系,也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对辩证关系可谓是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sup>②</sup>)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的“隐性传承”。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原则指导之下,毛泽东曾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理论和实践、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有过详尽而具体的解读,这无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根基。

**(二)通过“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在毛泽东的理论视域之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性,而普遍性也是作为特殊性的“对偶性存在”,并且需要通过具体才可以加以理解与把握。这也意味着,没有抽象而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结合了特定时代、民族形式和文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在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并无二致,也并无优劣之分。“全盘西化”思潮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将不同文化之间的“中西”差异问题转化

为“古今”差异问题,即把文化的民族性差异转化为时代性差异,从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对此,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在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国家革命形式的关系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明确强调反对“全盘西化”倾向,认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sup>③</sup>。这也意味着,不思创新、僵化复制、盲从依附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可取。实质上,毛泽东正是在与张闻天、艾思奇、李达等人的学术交往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希冀在思想上清算党内长期存在的“言必称希腊”<sup>④</sup>的不良风气。所谓“言必称希腊”,实际上就是“言必称苏联”“全盘苏化”的隐喻,也就是不顾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照抄照搬他国革命经验的倾向。总体而言,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是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有机结合,从“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层面来判断中国具体问题,从而抽象出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的实践理论,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特殊道路并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乃至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两个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中国式体现,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获得中国式运用,而且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

1938年,毛泽东曾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即“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sup>⑤</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对该段文字做出重要修改: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①</sup>;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sup>②</sup>。在《谈话》中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更是明确表明自身的一贯态度,“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sup>③</sup>。这一重要判断内在包含了对普适性元素(一般)与本土性不同元素(特殊)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的回应,更是为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提供了重要铺垫。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逻辑嬗变,昭示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逻辑起点的全新开启:第一种结合是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第二种结合是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sup>④</sup>,即立足中国实践、坚守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话语。这也意味着,实践空间由西欧转换成中国;实践内容要跳脱于具体文字语句的窠臼之外;实践主旨是要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实践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织中国的帽子”<sup>⑤</sup>,而非搬来外国“帽子”本身。

## 二 中国化和国际化: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sup>⑥</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西有机结合”论,倡导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体现了将外国有用的东西“中国化”,同时也需将中国有用的东西“国际化”的双位视角。毛泽东是这样打比方的:“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

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sup>⑦</sup>根据“中西有机结合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并非只是吸取传统文化精神那么简单,恰恰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加工过程。

### (一) 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首要前提

在《谈话》中,毛泽东秉承自信自立的精神指出中国的东西同样有规律,认为“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sup>⑧</sup>。所以“中西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要求在守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保存好中国特点的前提下吸取外国有用的东西,从而真正实现外来文化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这也意味着,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丢掉自己的“老祖宗”,忘记“老祖宗”就是丢弃立足之根本,忘记“老传统”就是丢弃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中介。可以说,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践进程中所生发和创造出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强凝聚力和强包容性,呈现出经世致用以及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不同于西式文明逻辑的“此岸与彼岸”“存在与现象”二元划分的哲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则趋向于在对立中寻求包容与统一性,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圆融和合”理念。有学者从文化比较视野的角度,就曾高度概括了中国极强的文化个性:独自创生非从他受,自成体系与他者差异甚大,自古及今绵延独存,同化能力极强,影响力既远且大,具有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sup>⑨</sup>。而“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④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的更先进和更优越”<sup>①</sup>,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唐宋大家的绚丽篇章,到明清之际的宏伟画卷,无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智慧。即中华文明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及其先进性在近代以前时期中都有突出表现。其间内蕴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也深度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双方优势互补”和“双方功能互补”**

在《谈话》中,毛泽东跳出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窠臼,多次倡导在学习外国先进东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点进行创新,一方面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重视民族的东西,即“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sup>②</sup>。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使中西两个“半瓶醋”合为“一瓶醋”,从而产生既不完全是西方文化也不完全是东方文化的新文化来。而这一重大论断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问题。即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国家治理思想以及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即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种文化精神存在着某些内在的文化精神价值的融通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沃土上生根发芽,不仅仅是中国特定

时空条件下的历史选择,更是一种文化选择,切合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时空阶段的一种内在发展需求。历史地客观地来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塑了我们国人的“中国性”,形塑了中国人的文化自我。因此,“儒学的‘过时’,并不妨碍它依旧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最重要的解释学背景”,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活’起来的不可无视的绝对前提”<sup>③</sup>。而在持续葆有文明定力的大前提之下,进一步实现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创造性发展,需要以构建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为目标加以进一步传承、弘扬、发展和繁荣,同时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博采其他文明的优长。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批判及改造的实践过程**

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架构,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则呈现出民族性特征。而不同文化系统在不同境遇下的发展过程呈现非同步性的逻辑表征,因而异域文化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会产生势位差。这也意味着,中学西学结合不仅仅会改变中国形象、中国面貌,同样也会改变西学本身。即“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sup>④</sup>。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会反向推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谈话》中,毛泽东虽是同中国音乐工作者探讨学习西方艺术文化进行中西结合的问题,但谈话中关涉的“中西结合论”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问题。其中毛泽东在1938年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实质上本身就包含了“接着马克思主义讲,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双重维度的深刻意涵:一是立足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实际,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

①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③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9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史上优秀的历史智慧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二是在立足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先导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思想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三是更加自觉地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思想智慧、价值观念、精神追求、道德规范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而实现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从“范式接入”到“话语转换”、从“中西对峙”到“中西结合”、从“在中国”到“中国的”等四重维度的逻辑嬗变。

马克思主义在异域地理维度和文化特点下的中国发展融合过程也并非是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直接位移”,这一过程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表达的创造(即适应中国特定历史性实践境遇和特定精神文化轨道下的具体形式)为中介的。这也意味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不仅需要在实践层面充分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也要使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即一方面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具体历史地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西方理论—中国应用”),另一面也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和世界文明发展大势,使得五千多年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思维等即中国文化的精、气、神能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得到充分彰显(“中西结合—民族形式”)。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须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关键环节。这一关键环节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发展诉求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节奏相协调,从而使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文化精神得到当代传承和弘扬。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两相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须臾离不开对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科学扬弃后的为我所用,须臾

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现代化转化。一言以蔽之,对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和当代弘扬并非是“过去完成时”而恰恰是“现在进行时”。

### 三 传统性与现代化: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子”

在《谈话》中,毛泽东尤其强调,要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即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而非是对西方“帽子”本身的简单复制,其目的在于学来以后要织好“中国帽子”以期实现对固有优秀东西的有机改造和发扬,创造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一概排斥引进外国的先进东西,也不能对其加以全盘吸收乃至全盘西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点,“结合”的理论成果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是21世纪的孔夫子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持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循和根本原则。“两个结合”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对接与拼凑,它的根本在“马克思主义”,关键落脚点要在“化”上做文章。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改旗易帜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绝非是空洞抽象的字句语段。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马克思最忠诚的学生,也是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传人。其忠诚就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坚持,并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它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根基与民族血脉。

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中国环境下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科学理

论(立场、实践检验过的观点和方法论)与“中国特点”(中国具体实践)、“民族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动态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有用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上扎根、开花、结果(具体化、民族化和通俗化)的过程,也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克服其历史局限,以反向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实现了双方优势互补、双方功能互补,又充分凸显了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容受性和创造性特征。其中容受性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外来的东西;创造性就是它能够把外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或者思想资源,加以锻造与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在《谈话》中,毛泽东就对如何正确处理学习西方有用的东西与守好中国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sup>①</sup>。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既要学习“西方”也要规避“全盘西化”,既要保持民族性也要彰显时代特色,如此方能化解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二)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启迪我们必须注重“结合”,才能既克服教条主义、避免狭隘经验主义,又解决中国问题**

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sup>②</sup>这一逻辑判断中包含双重意蕴:其一是对外来文化要求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其二是从满足中国现实发展需要出发,学习西方的“技术工艺”和方法论(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将其作为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这也意味着,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历史条件和具体实际,离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得出的个别

论断。该种习惯于从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寻求亘古不变的药方,并剪裁瞬息万变的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相割裂、认识和实践相分离、理论和实际相背离的主观唯心主义(即黑格尔视域中的外部反思或者说是外在反思的方式。该种外在反思方式作为一种推理能力,从来不深究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沉溺于抽象的一般原则,且僵化地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中国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境遇也充分佐证了,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一旦陷入对文本(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句)的迷信教条窠臼之中,则会导致革命失败或者在发展进程中付出惨痛代价(“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论”等都是例证);而能够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境况对原初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实事求是地反思和发展,则使其科学指导作用和辩证开放性特质能够在中国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充分呈现。即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去,并且从这种社会现实的具体内容当中来制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才可能真正取得革命的成功。

**(三) 坚持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本质上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可以说,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秩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就在于建构起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现代化转型)<sup>③</sup>。在被迫成为西方学徒的过程中,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现代化转型乃至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指导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

<sup>①</sup>《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sup>②</sup>《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sup>③</sup>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法性”<sup>①</sup>。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马体西用”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中体马用”过程,二者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渐进转型中互相推进,共同融汇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摸索进程之中。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需要赓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落脚点就是寻求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根本道路。其间从中国现代化之时代主题的变迁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革命实践进程中日益凸显和形成的,在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鲜明品格的同时,也深刻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体同构性。任何一种发展道路要想达到真正成熟,就意味着它要在

特定的阶段走出对西方固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学徒状态(从“照着西方说”实现“接着西方说”),并展开对自立的、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谈话》中,毛泽东就曾郑重发问:“地球上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sup>②</sup>对此,在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中创设中国本土式现代化逻辑的自我主张和本我话语,一是需要正视和经历一种文化结合的断裂、重新审视东西方不同文化特点下的客观差异性;二是避免将抽象的普遍性现代化发展进路先验地强加给不同时空语境下的特殊场域。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渐进摸索现代性发展规律的过程,同样也是理性把握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辩证关系的过程。

##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Mao Zedong's "A Talk with Musicians" to Promote "Two Combinations"

LUO X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1956, Mao Zedong specifically discussed that art should have national style and national form, emphasized that China's things have their own laws, and reiterated the logical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revolutionary expression. This series of important the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inicization" contain many pairs of philosophical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national forms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sinic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which are conducive to furthe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First, the form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should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eco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hould change from two "half bottle of vinegar" and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into "one bottle of vinegar". Third, we should critically absorb and learn from the western method of "weaving hats" to make "Chinese hats".

**Key words:** Mao Zedong; "two combinations"; general and special relationship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校对 葛丽萍)

<sup>①</sup>何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1期。

<sup>②</sup>《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